

# 泰勒·斯威夫特《信天翁》歌词中的文学典故

谭楷文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中国

**【摘要】** 本文以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在其 2024 年专辑《被折磨的诗人俱乐部》(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 中收录的歌曲《信天翁》(The Albatross) 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其歌词中引用的三大文学典故——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玫瑰与匕首意象, 以及圣芭芭拉传说中的高塔隐喻。通过细读歌词文本并结合文学互文理论, 探讨斯威夫特如何在流行音乐创作中重构这些典故, 将其转化为表达女性主体性、揭示性别偏见和反思舆论暴力的象征体系。研究发现, 《信天翁》不仅在象征层次上实现了古典文学与现代语境的融合, 还在叙事策略上颠覆了传统的性别二元结构, 使女性形象从被动受害者转化为具有救赎力量的主体。这一创作实践体现了流行文化在当代文学传播与改写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泰勒·斯威夫特; 信天翁; 古舟子咏; 文学典故; 女性主义

## 1. 引言

在 21 世纪的流行文化中, 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的艺术形象已从一位创作型歌手, 发展为一位带有“文化叙述者”特质的现代诗人。她的音乐, 尤其是其近年来创作的《民俗传说》(Folklore)《永恒传说》(Evermore) 以及《被折磨的诗人俱乐部》(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 三张专辑, 展现出浓厚的诗意表达与自我抒情倾向, 已经超越了流行音乐的通俗界限, 趋近于“诗的音乐化”。而这一创作风格, 与英国文学史上的湖畔诗人 (The Lake Poets) 群体有着令人惊异的共鸣。她不仅在音乐作品中频繁涉及自我反思与社会议题, 还在歌词中大量使用象征与典故, 为听众提供多层次解读空间。其最新专辑《被折磨的诗人俱乐部》直接以“诗人”为题, 展现其在语言、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野心。

湖畔诗人是英国浪漫主义初期的代表性写作团体, 以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和骚塞 (Robert Southey) 为代表。他们常居英格兰北部湖区, 重视自然、感情与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 在动荡的时代中保持对个体内心的敏锐体察。他们所强调的心灵自由、自然回归与感情真实, 与斯威夫特近年来试图挣脱公众舆论、强调女性独立表达的努力有着惊人的相似。值得注意的是, 柯勒律治作为“湖畔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 他倡导自然美、抒情表达与内心探索,

其创作强调个体情感与对抗现代性的压力。尤其是《古舟子咏》中“充满的哥特式的故事的恐惧、恍兮惚兮的神话、怪诞的异国情调, 以及所象喻的那种迷茫怅恍、飘渺幽微的意绪, 的确把该诗谱写成一首微妙奇异的梦幻曲”[1]。这一创作群体的审美追求, 与泰勒·斯威夫特近年来作品中的诗意气质、孤独主题、个体挣扎等内容形成隐秘而坚实的共鸣。

事实上, 由于歌词“是用高度概括的、精美凝练的形象化语言来创作的, 来刻划文学形象的, 语言通俗, 大众化、口语化, 因而人们通过对歌词文学形象的审视, 就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整个歌曲所要表现的内容及其特点。”[2]在该专辑中, 《信天翁》(The Albatross) 作为一首意象鲜明、主题复杂的歌曲, 吸引了大量评论者与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歌名“信天翁”本身即是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名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提取的关键意象。这首 18 世纪末的长诗通过对自然、命运和道德负担的描绘, 揭示了人类行为与自然法则之间的深刻联系。就如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借信天翁讲述一段关于罪与救赎、孤独与超脱的心灵之旅, 斯威夫特亦在《信天翁》中用诗意语言与叠加隐喻, 对女性如何面对舆论与背叛展开抒发。她将自己构建为同时背负被误解、被抛弃、被神秘化的信天翁, 仿佛与湖畔诗人们隔世共鸣。

## 2. 《信天翁》中的文学典故与文本重构

柯勒律治作为湖畔诗人代表之一，其诗歌风格极具神秘主义色彩，关注心灵的漂泊、精神的幻灭与救赎。他本人一生饱受精神疾病困扰，在人际关系与文学名声中始终保持距离感。对于诗的创作，他认为“必须是一个整体，它的各部分相互支持、彼此说明；所有这些部分都应按其应有的比例与格律的安排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它那众所周知的影响相谐和，并且支持它们。”[3]因而借由水手与信天翁的对立创作《古舟子咏》正是他对人类罪责、宗教负担与个体孤独的深刻展现。诗中那位杀死信天翁、被孤立于海上、遭受命运惩罚的水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寄寓了诗人的精神挣扎。同时，“流行歌曲歌词创作作为艺术类型之一，与诗歌创作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4]这一挣扎，在当代流行文化中，以不同的面貌重现于泰勒·斯威夫特的作品中。斯威夫特也常被迫面对外界道德化、神圣化或妖魔化的舆论视角——她如同信天翁一般被众人所指，同时承受天启与诅咒的双重视角。此外，湖畔诗人对自然与感性的神圣性强调，也在斯威夫特歌曲中形成一种回响——她重视梦、心、风、火雨等隐喻，将其作为情感与象征桥梁。她不仅延续了诗人那种将自然现象转化为精神意象的技巧，也强化了诗人与听众、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共情纽带。

### 2.1 《古舟子咏》中的信天翁与斯威夫特的反讽运用

《古舟子咏》中，信天翁原是幸运与希望的象征，是“至善的上帝”派来“解救人类带罪的灵魂”的使者[5]，然而在主人公将其射杀之后，它转而成为灾祸与道德惩罚的象征。柯勒律治通过让舟子背负“杀鸟之罪”，形象地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及其后果。这只信天翁最终被挂在舟子脖子上，成为一种持续的负担，直到忏悔与救赎实现，象征着罪与救赎的循环。

斯威夫特则巧妙颠倒了这一传统结构。在她的歌词中，“她就是信天翁/她来毁灭你”（She's the albatross / She is here to destroy you）不再是惩罚者，而是被塑造成“灾难之源”的女性形象。这里的“信天翁”不再是人类杀死的吉兆，而是舆论与社会赋予女性的“原罪”与“灾难标签”。这是一种典型的性别结构逆转：女性被视为危险，却从未真正握有权力。

此外，斯威夫特借由“划过你无心之胸/

唯有烈酒为你膏沐”（Cross your thoughtless heart / Only liquor anoints you）一类句式，模仿古典诗歌的道德预言风格，却在语气上表现出强烈的讽刺与控诉，使得女性角色从被动的负担形象转化为主动的叙述者与象征重塑者。歌词中不断强调“我试图警告你他们”（I tried to warn you about them），进一步加强了“她不是毁灭者，而是先知”的主题核心，隐含对现代女性被误解、妖魔化的反讽。

### 2.2 莎士比亚式意象：玫瑰、匕首与诱惑者

斯威夫特的歌词开头“智者曾言 / 玫瑰易名亦成谤”（Wise men once said /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is a scandal）明显是对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句广为流传的“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的改写。原句强调爱情的纯粹性与社会偏见的无理，而斯威夫特的改写却揭示了当代社会对女性名誉的极端放大与曲解。女性一旦脱离传统道德规范，就可能被标记为“丑闻源头”，如同被重新命名的玫瑰失去了“应有”的芳香。

“又少一位红颜祸水 / 又少一柄待砺的刃”（One less temptress / One less dagger to sharpen）中，诱惑者与匕首之间的并列使用，让人联想到《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引导丈夫杀害国王的场景。诱惑与刀刃、女人与暴力、欲望与背叛构成一组文化旧有的性别隐喻系统。斯威夫特的用法却带有批判意味，她将这些词语放进男性视角之中，用以指出女性在男性叙述体系中的被动标签化与妖魔化。

### 2.3 圣芭芭拉传说中的高塔意象与梦境超越

“英美文学中的典故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神话与传说故事，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氛围，具体包括古希腊神话故事、基督教的《圣经》、经典文学作品与寓言故事等。”[6]歌词中“将我囚于高塔/却仍出现在你梦中”

（Locked me up in towers / But I'd visit in your dreams）所用的塔与梦意象就具有高度宗教与女性主义象征意义。其灵感可能部分来自圣芭芭拉的传说——她是基督教圣人之一，被父亲囚禁在塔中，因坚持信仰而殉道。塔在这里是父权制的代名词，是对女性行为与思想的限制空间。

然而，斯威夫特歌词中的“梦”却代表着超越现实的情感维度。即便女性被剥夺了现实行动、的自由，她仍能通过“梦”的路径，进入他人意识，表达意志。这一表达方

式借用了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梦境美学，与湖畔诗人重视内心世界、反对工业社会异化倾向的理念相互照应。斯威夫特借由圣芭芭拉式形象建立起女性从受害者到“精神游击者”的象征图式。

### 3. 文本结构与情感表达

在文学与音乐的交汇处，作品的结构往往不仅仅是形式的安排，更是意义生成的重要途径。《信天翁》的歌词结构并非线性叙事，而是呈现出一种环环相扣、递进推进的组织方式。它以固定句式作为段落开端，在听觉上形成强烈的记忆点，同时在语义上建立一种“警示—回应—反转”的叙事节奏。这种结构选择，使得歌曲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承载复杂的情感变化：从外部评判的冷漠与指责，到内心的困境与挣扎，再到自我确认与力量释放。正是这种由结构推动的情感递进，使得《信天翁》具备了跨越流行歌曲惯常表达的深度与张力，也为其典故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叙事支撑。

#### 3.1 三段式叙事结构

论全歌由三段歌曲节构成，每段均以“智者曾言”（Wise men once said...）引出不同警示语，分别牵涉外界偏见、诱惑危险与舆论谣言。歌词结构仿若三则警世寓言叠加，每段的结尾或转折汲取前段主题，使叙事层层递进。

这一重复性的开篇句式，既是一种形式上的结构锚点，又具有叙事功能：它模拟了古典寓言、谚语或宗教劝诫的开场方式，在听觉上为听众建立了熟悉的节奏预期，在语义上则为每一段故事营造出权威话语的外壳。这种设计巧妙地将听众带入一种被教导或被警示的氛围之中，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歌曲得以对既有的道德话语体系展开反讽和重构。

第一段歌词中，斯威夫特将玫瑰与信天翁意象并置，形成了一种兼具浪漫与灾难的视觉冲击。开篇的“狂风会熄灭烛火”（Wild winds are death to the candle）是一个带有谚语色彩的比喻，暗示外部力量对脆弱事物的摧毁，与后续“玫瑰换名即成丑闻”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is a scandal）的改写形成呼应。这一段的结构核心，是从浪漫主义式的自然隐喻过渡到对现代社会舆论偏见的讽刺批判，完成了从自然寓言到社会寓言的语境转化。它在情感上呈现出一种被外界指责、标签化的压迫感，为整首歌奠定了

冲突基调。

第二段结构上延续了开篇的固定句式，但在主题推进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歌词中的坏种（temptress）、匕首（dagger）、高塔（tower）等意象，进一步加重了压迫与威胁的氛围。这一段的叙事焦点是“囚禁与潜入”——表面上，女性主体被锁在高塔之中；然而，“想象使内容具有了形式，而形式也因想象而获得了内容。”[7]通过“在你的梦中出现”（I'd visit in your dreams）的叙述，主体突破了物理桎梏，进入精神领域进行情感干预。这一段的结构作用，是将第一段的外部标签化冲突转化为内部的心理较量和精神渗透，使得叙事层次从社会表象深入到心理内部。

第三段则是结构上的高潮与情感上的反转。依旧以“智者曾言”开头，但随即引入了“假新闻”（fake news）“豺狼”（jackals）等现代传媒与舆论的象征，凸显外部敌意的组织化与操控性。情节在“我如伞翼般展翅，疾掠而至，前来救赎”

（Spread my wings like a parachute / I'm the albatross I swept in at the rescue）处发生关键转折——信天翁形象不再是外界附加的负担与诅咒，而是主体自我认领的身份与救赎力量。此处的“降落伞”意象在结构上呼应了开篇“烛火”的脆弱，但却以截然相反的意义出现：降落伞象征着安全、缓冲与拯救，显示主体已将脆弱转化为力量。

总体而言，这一三段式结构与戏剧创作中的三幕式（Three-Act Structure）存在内在呼应：第一段是设定（Setup），呈现冲突背景与外部威胁；第二段是对抗（Confrontation），深化矛盾并引入心理层面的突破；第三段是解决（Resolution），通过身份反转与力量展现实现冲突化解。这种由固定开篇句式连接的分段结构，使得歌曲在形式上具有循环感与稳定性，在内容上则具备递进性与戏剧张力，成为承载多重典故与复杂情感的有效叙事框架。

#### 3.2 隐喻层叠与情绪递进

所谓隐喻，并非晦涩难懂的遣词造句，它可以被看作为“从一个自我毁灭、自我矛盾的陈述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自我矛盾的句子”[8]。歌词隐喻丰富：烛火、玫瑰、匕首、塔、火雨、假新闻、禽兽、鸟翼、降落伞等多重意象错综交织，语义从易碎、诱惑、牢笼、危险、重生逐步演进。女性角色从被批判对

象转变为拯救者，充满矛盾。斯威夫特将毁灭的信天翁逆转为拯救的人。情感节奏也由被指控（毁灭者）→囚禁压迫→公共舆论围攻→自我救赎，最终形成一种诗意化的自我重生叙事。斯威夫特在《Albatross》中借助古典文学与宗教典故，重新赋予信天翁、玫瑰与高塔等经典符号以女性主体的情感与理性：她既是危险，也可能是救世主；她既被压迫，也能突破重围。这种叙事策略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义意义——拒绝单一定型与被动定义，以多面镜像或隐喻结构对传统男性视角进行抵抗与重构。

《古舟子咏》强调的是“一直在失望与梦想、孤独与悔恨、恐惧与焦虑的情绪中起伏波动的老水手的心灵历程，是代表全体人类的。”[9]然而，在与《古舟子咏》的对话中，斯威夫特不是重演罪恶与忏悔结构，而是将“杀鸟者”与“被标为负担者”的二元模式予以翻转，以女性主动作为救赎者；她既承担“信天翁”象征，也借此身份实现自身的表达与救赎。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非语言性的艺术和抽象的艺术……但通过动机的象征含义、旋律的模仿能力以及文字的描述等手段，可以使音乐具有画面感。”[10]这一观点揭示了音乐在本质上的抽象属性与其具象化潜力之间的张力。音乐本身依靠旋律、节奏与和声传递情绪氛围，但在歌词的介入下，它能够被赋予更明确的叙事走向与象征意义，从而使听众在听觉体验之外，获得视觉化与情境化的联想。在《信天翁》中，这种画面感不仅来自旋律与音色的配合，更源于歌词对文学典故的巧妙挪用与再造，使得抽象的音乐情绪得以通过意象链条具体化，并与听众的文化记忆发生共振。

莎士比亚传统中的玫瑰与匕首常用于塑造女性的被动或受害形象，这种意象组合在西方文学史与戏剧传统中往往承载着爱情悲剧、欲望冲突与性别牺牲的叙事母题。然而，斯威夫特在歌词中并未延续这一符号的传统功能，而是通过语境转换将其转化为带有自我防卫与主体发声意味的警戒与反击工具。玫瑰在她的笔下不再只是脆弱、美丽却易逝的象征，而是承载社会对女性名誉审视的文化符号；匕首也不再仅仅作为男性暴力的象征物，而是女性在权力失衡环境中争取话语权与生存空间的隐喻。这种符号再造，解构了单一化、弱势化的女性形象，为其注入了

行动性与批判性。

圣芭芭拉锁塔的典故在宗教与文学传统中，象征着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体与思想的双重禁锢，同时也因圣者的信仰坚守而赋予女性某种道德崇高感。在斯威夫特的创作中，高塔的意象依然保留了象征压迫与孤立的功能，但她引入了梦境的叙事维度，使被囚禁的女性形象获得超越物理空间的精神自由。在梦境中出现的主体并非消极等待救赎，而是主动跨越界限，与他者建立精神联系。这一改写不仅为传统典故赋予了新的解释空间，也体现出现代女性在面对结构性压迫时，通过精神能动性 with 创造性表达来重构自身身份的可能性。

#### 4. 结论

综合来看，《信天翁》可视为流行音乐中经典文学意象现代化的典范。斯威夫特透过三大典故——《古舟子咏》的信天翁象征、莎士比亚中的玫瑰与匕首意象，以及圣芭芭拉囚禁塔形象——建构出一个复杂的叙事世界。在那里，女性不再只是负面的符号，而是主动叙述者、救赎者与颠覆者。歌曲语言虽然平易近人，但承载的文学层次丰富，既对经典文献进行跨时代对话，也回应当下公众舆论、性别政治与女性自主等议题。这种典故与现代语境融合的方式，展现了流行音乐在文学意象传承与创新中的力量。通过将“信天翁”从罪与忏悔的象征转化为女性自我表达与救赎的符号，斯威夫特超越了原典的局限，将经典文学意象与个人身份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表达。

更重要的是，斯威夫特在《信天翁》中通过信天翁的形象，并非仅仅进行一次文学引用，而是与柯勒律治，以及更广义上的湖畔诗人群体进行一种跨越世纪的心灵呼应。湖畔诗人创作于工业革命前后精神与自然断裂的时代，他们用诗歌抵御喧嚣与幻灭。而斯威夫特，则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狂潮中，用歌词建构内在宁静与真实感的庇护所。柯勒律治笔下的古舟子犯下不可逆之罪，背负信天翁进入救赎之路；斯威夫特笔下的女主角，却是被赋予“信天翁”标签的那一方，她用自我叙述挣脱这一道德标签，完成女性的反转叙事。这一对比正体现了两个时代对责任、指责、个体价值这类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

最终，从湖畔诗派到《信天翁》，文学始终是个体在社会中寻找声音、承载记忆、

表达情绪的工具。斯威夫特继承了湖畔诗人的情感张力与象征结构，并以当代语境、女性视角、音乐形式，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她不是“模仿”诗人，而是将他们的精神遗产转化为时代语言，证明了文学与流行文化之间不必存在高低之别，而是可以彼此辉映、共同演化。当代流行歌曲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现场”：不仅传达情绪与故事，也在符号层面对传统文本提出质问与改写，促使听众重思文化象征的性别含义与现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刘剑锋.奇异的梦幻曲 怪谲的蒙太奇——论《古舟子咏》的艺术手法[J].甘肃社会科学, 1996, (01): 80-82.
- [2] 储佩成.论歌词文学形象的创新——兼评《春天的故事》等歌词创作[J].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1, 14 (3): 50-55.
- [3] 柯勒律治.文学专记[M].英国: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4.
- [4] 常立霓.“歌词文学”理论创建的思考[J].大众文艺, 2011, 12: 104-106.
- [5] 王丽.《古舟子咏》中的信天翁意象[J].巢湖学院学报, 2009, 11 (05): 72-76+129.
- [6] 王丽, 邓桂华.英美文学典故的翻译考虑因素及技巧分析[J].语文建设, 2014, 03 (08): 73-74.
- [7] 李增, 龙瑞翠.论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及其诗学理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3 (03): 109-115.
- [8] 束定芳.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02, 34 (02): 98-106+160.
- [9] 吴舜立.多重象喻 本体指归——《古舟子咏》文本解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26 (04): 147-152.
- [10] 魏登攀.“中国化爵士乐”: 跨文化视野下的音乐变异研究[J].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5, (04): 254-268.